

誰不想

译名惊人

——书名译评经眼录



國防工業出版社

National Defense Industry Press

杨全红
编注

谁不想译名惊人？

——书名译评经眼录



国防工业出版社

<http://www.ndip.cn>

本书收集和整理书名译评典型个案 150 例,其中,汉译外 30 例,外译汉 120 例。个案多为文学作品,也有少许社科名著。相关书名包括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海上花》、《倾城之恋》及 *Living History*, *A Briefer History of Time*, *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* 等。除了精彩的译评文字,本书还提供部分难得的注解;或提供背景,或补充新知,又或纠正偏颇。

本书适合广大翻译工作者和学习者使用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不想译名惊人?:书名译评一百五十例/杨全红编注.

—北京:国防工业出版社,2011.1

ISBN 978-7-118-07157-3

I. ①谁... II. ①杨... III. ①英语—翻译—研究
IV. ①H315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32091 号

※

国防工业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 23 号 邮政编码 100048)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经售

*

开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8½ 字数 192 千字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—3000 册 定价 25.00 元

(本书如有印装错误,我社负责调换)

国防书店:(010)68428422

发行邮购:(010)68414474

发行传真:(010)68411535

发行业务:(010)68472764

本书为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科研项目
《书名译评一百例》之最终成果及重庆市社
会科学界联合会科研项目《译名研究在中
国》之阶段性成果。



本书的主标题是“谁不想译名惊人?”其副标题为“书名译评经眼录”。顾名思义,书名的翻译与评论(即对译名的评论)是本书的核心内容。不过,鉴于书名的翻译与译名的评论又与原作者和出版社有着一定的联系,下面不妨从作者、译者、书商和评者等角度切入,对书名的拟定、传译、遴选及评论等问题分别简作探讨。

1

在《寻找与寻见》一书之《后记》中,李文俊先生说过这么一句话:“集子编完了,自然会想起书名问题。”接着,李先生打了个比喻:“天底下,哪个父母不曾为刚出生、甚至还未出生的子

女操过取名字的这份心呢?”“操心”二字道出了书名拟定的来之不易。对此,作家秦牧有过献身说法,称自己写千把字的文章不过两三个小时,而取一个书名有时竟苦思终日,间或还得把想到的各种题目一一写在纸上并反复推敲。正因为此,秦先生笔下的《艺海拾贝》、《语林采英》、《长街灯语》、《晴窗晨笔》等书名没有一个是信手拈来的。行文到这里,我们特地浏览了一下书架,发现不少书名也都是操心和推敲而成:《鸡窗集》(夏志清)、《春泥集》(陈乐民)、《鸿爪集》(章开沅)、《向隅集》(止庵)、《银翘集》(杨宪益)、《余墨集》(陆谷孙)、《译边草》(周克希)、《翻译方圆》(郑延国)、《东写西读》(陆灏)、《去日苦多》(杨宪益)、《随无涯之旅》(周振鹤)、《文字岂是东西》(刘绍铭)、《文字是肉做的》(董桥),等等。

说到书名拟定煞费周章,脑子里忽然迸出几个有意思的篇名来:《无题》、《不,真的无题》、《题未定》。读这些标题,多少可以感到作者的无可奈何。图书命名中也有类似情况,俄国作家巴枯宁的一本诗集就“真的无题”:该书封面上没有名称,连“无题”等字样都没有,替而代之的是一首反映书名难求的诗歌,其中几行如下:“书名至今让人苦恼,/冥思苦想,额头搓出了老茧。/一本没有题目的书,说真的,/哪个学生和老师愿为它掏腰包?/这是一首长诗!……可没有题目!/真糟糕!让人贻笑大方!”在为自己的著述取名时,英国诗人兼散文家 Hilarie Belloc 也曾险些江郎才尽。事情是这样的:Belloc 有六册文集急着出版,因为没有想到更好的名字,他先后使用了以下标题: *This and That and the Others* (《这个那个集》), *On Something* (《谈点什么集》), *On Anything* (《什么都谈集》), *On Nothing* (《什么都不谈集》) 和 *On Everything* (《无所不谈

集》)。可到第六集时,该用的“东东”(thing)俱已告罄,巧妇难为,该怎么“收场”呢?最后,落下的那孤零零的 *On*(《谈》)字“救”了作者。

在《一炉烟火》之《前言》中,刘绍铭先生说:“书名要让读者记住,多少得巧立名目。”因为要“巧”,大都来之不易。又因为来之不易,主人家无不期望自己的书名既能“深得吾心”又能博得他人好评。刘先生称二三十年间他在港台出版的著作大大小小的总有十多本,而为每册书定名也着实踌躇过一阵子,但检视旧作,自认为接近英文所谓 *cute* 者只有三个:《偷窥天国》、《灵魂的按摩》和《吃马铃薯的日子》。范用曾撰《得书日志》一文,其中说:“李黎自美国来与朋友欢聚,赠我散文新集《翡冷翠的情人》。久违了‘翡冷翠’,当年徐志摩译 *Firenze* 为‘翡冷翠’,李黎取为篇名书名,甚美。……钟叔河夫人朱纯寄赠《悲欣小集》,非卖品,自费印三百本赠送友朋,……书名取自弘一大师李叔同所书‘悲欣交集’易一字。”从以上二例来看,一些人对自己或他人的书名确是在意或留意的。在《为红袖文化招魂》一书里,董桥先生也说:“我向来很喜欢留意篇名、书名的好坏,觉得这是表现作者对文字敏感不敏感的所在。”董先生本人曾著《文字是肉做的》,而他人则说“董桥是文字做的”。知道这一背景,便会明白董先生为何“喜欢留意”书名(及篇名)了。董先生对有关名称留意的方式之一是对其进行品评:“平铺直叙的题目自有简洁的魅力”,如《敞开的门》、《老相好》、《宋家姐妹》、《城南旧事》、《像我这样的女人》;“有些题目有色有香有味,看了动心”,如《桂花巷》、《菊花的香气》、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;“文艺提升到乡土的层次,效果通常都很不

弱”，如《嫁妆一牛车》、《西禅寺的钟声》、《红树林思绪》、《红陶罐·红蜻蜓》。在董先生看来，“比较可怕的是以文艺滥调为题”，如《歌唱的年代》、《月色下的飞翔》、《静止在飘荡之中》、《玫瑰玫瑰我爱你》。

2

有人曾请老报人和翻译家朔望谈谈译书命题之道，他说：“译书拟题十分重要，因一、凡善为文者无不讲究品题一道，若仕女之眼神与装式，应深究其用心，方不唐突原作，此于当代尤然。”“若仕女之眼神”，与人们将书名譬为作品之眼睛正相暗合。所谓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”别致而隽永的标题就如少女动人的笑容和迷人的眼神，往往能使读者一见倾心甚至过目不忘。正因为是“点睛”之笔，虞建华先生才要说：“此处翻译不当，对整部作品精神内涵的传递影响很大，因此格外需要慎重对待。”杨岂深先生也持类似看法，他说：“书名译得好或甚至改得好，有画龙点睛之妙；译得不好，即使全书译文质量高，难免令人感到‘意犹未尽’。”书名传译的权重由此可见。也正因为此，书名翻译从来就是翻译研究的热点之一，成果也可谓丰硕。

译事不易为，人所共知。至于哪些东西才是翻译中的难点，人们的看法不尽一致。客观而言，并非所有的书名都难译，*The Old Man and the Sea* 译成中文便不需什么能耐。但大多书名，又特别是那些本来就有讲究的书名，要传出其精髓或机巧往往就费力难为了，搔首问天的情况也绝非没有。比如，迪克·马斯有一剧本，名叫 *Amsterdamned*，作者把城市名“阿姆斯特丹”（Amsterdam）和“被

诅咒的”(dammed)二字有意地拼在了一起,译成《被诅咒的阿姆斯特丹》固无可,但原名构词上的新奇荡然无存,译成《阿姆“死”特丹》也许有点意思,不过好些人恐怕又看不明白译者想表达的竟是“该死的阿姆斯特丹”这么一种意思。又比如,索尔·贝娄有部短篇小说,名为 *Leaving the Yellow House*,写的是发生在黄房子主人身上的故事。该房屋主人是一位老太太,因为贫病交加而成为邻里负担,大家都巴望他早一点“离去”,而老太太在大限将临时也在思考,自己唯一的居所和财产,也就是那黄房子应该“留给”谁?最后,举目无亲而又备尝人间冷漠的老人半醉半醒中立下遗嘱,将黄房子仍然“留给”了自己。很显然,书名中的 *Leaving* 一语双关,而恰如余光中先生所言:“双声与双关,是译者的一双绝望。”写作此序过程中,我们一直试着为上述作品想出个中意的译名来,脑子里也先后出现过《晚年徒“栖”凉》、《携黄房入黄泉》等译文,但终究不甚合意。

从相关翻译史来看,我国书名的翻译方法经过了这么一条衍变轨迹:意译甚至另起炉灶曾经盛极一时,林纾的好多译名便是如法炮制的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,人们的翻译观及审美取向发生了变化,直译于是后来居上,现今更得到越来越多的学理支持。虞建华先生说:“在文学作品标题的翻译中,直译——按字面忠实地译出原作品标题——往往就是最恰当的翻译。这几乎是一条‘黄金原则’。”周晔与孙致礼等同志更表示:“实践证明,无论翻译哪种题材的作品,文学文体也好,科技文体也好,新闻文体也好,直译都是翻译英语书名、篇名的最为常用、也最可能行之有效的方法。”上述说法固不无道理,但“最恰当”和“最为常用、也最行之有效”等表述

也容易误导读者。在我们看来,正确的做法应该是:能直译则直译,不宜直译则另辟蹊径。换句话说,在书名传译中,我们在优先考虑直译的同时却也不能将意译甚至“臆译”一棍子打死。

有人曾经慨叹:要定义翻译究为何物十分困难,但要说说什么才不是翻译或翻译不是什么则相对容易。翻译都不是什么呢?有关论者的回答是:翻译绝非简单的语言文字转换。书名的翻译也许尤其如此,不仅要考虑是否传递了原文主旨,也要考虑文字上是否妥当或者文笔是否优美,有时候还要考虑是否“政治正确”以及是否便于发行等。王宏印先生在《英汉翻译综合教程》一书中开具过一个颇值得研究的标题名单,其中,书名翻译有这么几例:*Moment in Peking* 译作《京华烟云》, *Rebecca* 译作《蝴蝶梦》, *Red Star Over China* 译作《西行漫记》, *Gone with the Wind* 译作《飘》,《王若非在狱中》译为 *Iron Bars but Not a Cage*。王教授之所以认为上述译名值得探究,原因之一当是它们皆非简单的文字转换品,相反,各译都有可圈可点之处:或语言汉化,或典故入化,或风格纪实,或简洁含蓄,或解释深刻。其实,将 *Red Star Over China* “译”(易?)为《西行漫记》可能还不止是“纪实风格”几个字可以概括的。据有关同志回忆,当时采用《西行漫记》一名,主要考虑有二:一是人们见到“西”字便容易联想到我们的党;二是采用笔记体书名并避开“红”字可以迷惑敌人而便于在沦陷区和国统区印行。

3

《文汇读书周报》2006年3月10日刊有一封读者短笺,题为《“利”在作怪 书名取“坏”》。文中指出,时下跟风、暧昧、媚俗、黄

色的书名泛滥,其原因是“书名不坏,书商不卖,读者不爱。”这则短笺表明,书商为了迎合读者胃口,竟至于置出版道德及社会责任于不顾,这当然是错误的。“书名不坏,书商不卖”还表明,在书名的确定上,作者(包括译者)与出版社之间难免出现分歧。据我们观察,在就书名的“博弈”中,作者与出版社各有胜负,下面是几个实例。

上个世纪二、三十年代,鸪母 Polly Adler 名满纽约。到了 1954 年,她决定“改邪归正”,于是关掉妓院并隐居郊区养花种菜写回忆录。书终于就要出版,出版社建议她以 *Forever Adler* (永远的爱得乐) 为题,可她不同意,后来书名定为 *A House Is Not a Home* (窑子不是家)。该书名的诞生有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:有一天, Polly Adler 正在后花园给玫瑰浇水, Dora Maugham 去看她,见她洗尽铅华而过上平淡清净的生活,毛姆很是高兴,他不禁好奇地问 Adler: “警察要是看到你现在的生活,不知会作何感想?” Adler 说: “他们也许会失望,我家不是窑子了。”朵拉一听,兴奋不已,说: “太妙了,把这句话倒过来不就成了你回忆录的书名?” 就这样,有关图书不期而“遇”到一个让作者与书商都心仪的名称。

1933 年,蒋彝先生去到英国,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。1937 年,因为老家沦陷,蒋先生忧伤不已,于是到湖区散心。在那里,他用小时候父亲所教的一点中国画技法,在笔记本上做了些许小画,景似人非。回到伦敦后,他想将有关画作出版,也终于有出版社愿意出版,但有个前提,即不付稿费,仅以六册样书相赠,而且反对将

标题定为 *The Silent Traveller in Lakeland* (哑行者在湖区)。书商的想法并非没有道理,一个中国人去湖区游玩,有什么必要装聋作哑?当时国际局势又正紧,弄不好也许会惹来警方调查。不过,蒋氏坚持“哑行者”的笔名,出版社也最终让了步。出人意料的是,该书面世仅一个月,第一版即全部售罄,后来又再版八次,仍大受欢迎。这一销售业绩是否主要由书名带来,那倒未必,但至少也说明作者原定书名并无什么大碍。

加拿大诗人布迈格出版过一册诗集,取名为 *Colours*。金圣华女士将其译成汉语,书名拟定为《彩色系列》,可出版社认为这一名称太平凡无奇。不得已,译者只好再斟酌。后来,金女士去北京观赏白先勇《青春版牡丹亭》第 100 场演出。在首都机场,她迎面看到奥运主题口号——“同一个世界,同一个梦想”,心中于是琢磨“同一个梦想”到底都是怎么样的?她说:由于世上人种各异,文化不同,这大同的梦想必定是五光十色、多姿多彩而又融洽和谐的。换句话说,这是一个彩梦,而非黑白之梦。由于布迈格诗中所营造的世界在字里行间充满了如梦如幻、虚实交错的意味,因此,《彩梦世界》四字“顺理成章”地成了取代了《彩色系列》。

20 世纪 80 年代,有人将奥斯丁的长篇小说 *Sense and Sensibility* 译出,书名直译为《理智与情感》,出版社觉得这不像小说名,建议改成《两姐妹》出版,译者认为不妥而反对又无效,后来只好转到其他出版社再版,书名定为《理智与情感》。因为成天与书为伍,大多情况下,出版社在书名的斟酌上应该比译者更具发言权。中华书局曾经发行过一本书,题为《张集馨日记》。因为征订数太少,不能开印。后来,责任编辑将书名改为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并重新征订。

书还是那本书,更名后订数居然达到几万册,不久还得以重印。由此可见,有的时候,出版社确比作者更能把住“卖点”。

4

在上文中,我们提到过董桥先生的一句话:“我向来很喜欢留意篇名、书名的好坏,觉得这是表现作者对文字敏感不敏感的所在。”我们发现,对于图书译名这一类书名,“喜欢留意”的人也不在少数。而同董先生一样,人们对图书译名的留意也常表现在对其“说三道四”上。

喜欢对图书译名“说三道四”的都有哪些人呢?首先,他可能即是译者,毕竟传译过整部著作的译人对书名译文可能最具发言权;其次,当是广大的读者,说得细一点,读者又可能包括出版者、研究者、普通读者甚至原著作者。如果凑巧,某一译名的评论还可能既来自译者又来自读者。

人们对图书译名“说三道四”总得有个大致的标准,据我们观察,这一标准尚不怎么统一。从有关实例分析,人们最关注的是译名是否正确,也就是是否忠实地传递了原文的内涵、精神、主旨、功用、风格等。不过,鉴于作品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,相关评论自然也有所区别或有所侧重,具体而言,文笔、文质、语体、雅俗、音韵、义蕴、情感、情调、节奏、力度、意境、色与香、似与不似等都可能是考察和关注的对象。

由于种种原因,有的译名仅有孤评,有的则评论连连。在一名多评中,意见趋同甚至相同的情况是有的,这主要是某一意见面世后,甚得他人的认同,继而有了附和或跟进。值得一提的是,有的

时候,人们的结论虽然相同,理据却不一,比如,大家都认为将 *Oliver Twist* 译为《雾都孤儿》甚好,但有人是因为其简短、含蓄而又深邃而认可它,另外的人得出相关结论,原因却是该译名同时点明了地点(雾都,即伦敦)和人物(孤儿)。自然,对于同一译名,意见相异甚至相对的情况也是有的,比如,将 *Gone with the Wind* 译作《飘》,有的认为是“神来之笔”和“点石成金”,有的则又认为它“要不得”,因为显得“浮泛”和“突兀”。

由于学识、口味、习惯、翻译观等的不同,书名译评中还可能出现一种纷繁甚至“无序”的状况。比如,对于普鲁斯特的不朽巨著 *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*,不但译者不少,论者也多。从表面看,有的钟情《思年华》,有的青睐《追忆逝水年华》,有的心仪《追忆似水年华》,有的垂青《寻找失去的时间》,有的偏爱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。毫无疑问,有关选择的背后折射的是相关论者的不同“追求”:或强调原名的哲学意义,或重视译名的文采与诗意,或看重与作者其他书名的遥相呼应,等等。

综而观之,我国的书名译评还比较主观、随意,不过,一些学人已开始关注这一问题,比如,对于文学作品标题的翻译,虞建华先生即提出过应注意避免以下误区:自由发挥,媚俗倾向,脱离语境,过于直白。如果大家认可这些翻译主张,则相关译名的评论便也多少有章可循。尤其需要说明的是,即便有关评论还比较主观随意,它们也不无裨益。以上述普鲁斯特小说名的译评为例,许钧先生的一句话就很值得回味:“围绕着总书名的翻译所展开的争论以及所展示的种种观点,也使我们看到了对普鲁斯特这一巨著的理解是在一步步加深的。”

前言

Comments on Translation of Book Titles



中外图书译名千千万,这其中,有的出彩,有的平淡,有的蹩脚。对于这些译名,国人从来就不吝于品评。遗憾的是,有关评论虽有一定数量却分散在各种报章杂志和书籍之中,“让我一次看个够”完全是一种奢望。为了让大家能较为集中地领略我国书名翻译的是非成败,我们寻章摘句数年,终于“成就”了手头这本小册子。

从理论上讲,译作既多,书名译评意见也层见迭出,本书完全可以做成一册大部头。如果“经眼”便“录”,拣到篮里便是菜,本书确可以做得很厚很大,但那不是我们期望的产

品。经过权衡取舍,本书最终收录中外书名译评个案 150 例,其“准入”条件如下:或有新意,或有新知,或能带给读者启迪与思考,又或能与其他相关文字相补充和参证。

在编写过程中,特别是在材料收集阶段,我们力求占有每一份相关文献。遗憾的是,其中少许最终还是无缘得见。比如,网上有这么一条信息:伍学书曾出版一册《书名翻译试谈》,发行地为昆明,出版时间为 1988 年 9 月,书厚 56 页。这极有可能是国内第一本专论书名翻译的图书,其参考价值不言而喻,可任凭我们怎么找寻,结果仍只见其名而未获其物。

本书所选书名译评案例中,文学作品占了十之八九,余者主要为社科和时政类。文学作品书名的译评占去“狮子份儿”(the lion's share),这其实不难理解,毕竟此一题材有着最多的受众,而相关译评意见也至为丰富。就语种而言,本书所选个案中,英译汉占了绝大多数,其次是汉译英,再次为法译汉,也偶有其他语种之间的翻译。

在文字方面,我们尽量让每一个个案相对完整,有话则长,少话则短。为了把书做得小巧实在一些,我们在“存真”(即保留文字本来模样)和保证信息相对完整的前提下,对文章的起、承、转、合进行了必要的加工。在具体操作上,原文的多个段落多被糅为一段,也有将原文分而引之的情况。对于同一书名的多种点评意见,我们大致按照以下方式“先来后到”:先短后长,或先译者后其他论者,再或类似意见相对集中。

在实际录入中,我们发现,有关论者对书名的标识很不统一。以英语书名为例,有的用斜体,有的用中文书名号,有的用双引号,有的又什么都不用,还有的既用斜体又加引号或书名号,可谓花样百出。为了规范并相对统一,书中的英语和法语书名一律书写为斜体形式,中文书名和篇名则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使用书名号或者引号。此外,原始文献中屡屡有“钱钟书”一名,本书正文中统一书写为“钱锺书”。

本书正文之后跟有数十条注解,序号与正文相对应。粗粗看去,它们不外乎东拉西扯之类,仔细阅读便会发现,这些注解实属来之不易,内容上也与相关案例相得益彰:或匡正文字,或提供背景,或提供新见。

为了方便有兴趣的读者跟进,我们在每一则书名译评末尾特地给出了具体出处:如果出自作者本人的专著或文章,则直接标示书名及页码或刊物名称及期号;如间接引自论文集或他人书籍,则着“见”字于相关文献之前。注解中的出处说明相对笼统一些,这样做,为的是让有关文字读来更畅通更轻松。此外,因为某些原因,书中有两处页码一时查不出,暂标为“页码不明”。

周克希、杨岂深、虞建华、金圣华、曹明伦、黄友义等学人对书名译评多有贡献,没有他们的锦绣文章,本书的编注便成无源之水。在实际编写中,罗益名、鹿彬、尚雯文、周以等朋友和同学给予过友好而及时的帮助。对于以上列位,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。

在本书编写中,我们虽然付出不少,获得的却更多:不仅有新